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從有形市場到無形市場：市場演進對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模式 之影響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4-H-263-001-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致理技術學院國際貿易系(科)

計畫主持人：張弘遠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4 日

第一節、前言

壹、制度轉型與要素配置

「制度轉型」在中國大陸經濟研究中始終是個重要課題，在這個由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大陸透過雙軌制的方式進行了市場化與私有化的改革。¹改革最初是企圖修補計畫經濟體制中經濟短缺、生產低落的問題，以便恢復總體經濟的供給能力，但隨著價格機制的建立與農村經濟的改善，中國經濟結構出現了較具生產效率與競爭彈性的經濟組織——鄉鎮企業。²

鄉鎮企業快速發展提高了供給能力，同時刺激市場競爭機制的發展，進而誘發了第二個階段的改革——市場建制與企業產權的改革。由於在前一階段進行放寬價格管制與企業推動承包制等等的作為，意外引發了市場中失序的交易與盲目的投資，導致經濟發展步調的混亂。為此，大陸當局決定推動新一輪的改革，具體做法則是透過制度創新來改善金融體系、財政制度、市場交易秩序與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³隨著市場體制的擴大與計畫體制收縮，同時並搭配自西方引入的總體經濟管理模式，隨著市場化與私有化的持續，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因素開始由非計畫部門生產效率的提升，再加入市場交易成本的降低，這使得供給面的條件獲得改善，因而推動了九〇年代中葉以前的中國大陸經濟成長。

期間，中國大陸雖曾面臨多次短期景氣的波動，但整體而言卻是持續成長，根據拉迪（N. Lardy）的觀點，中國經濟成長大部分要歸因於勞動和其他生產要素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轉移配置，而不是生產效率的提高，拉迪更認為，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將是中國未來經濟持續成長與否的關鍵。⁴

貳、生產過剩與通貨緊縮

生產能力的提高固然會帶來經濟成長，但也造成了問題：國內市場需求不足。隨著大陸消費市場的日趨飽和、全球經濟進入景氣收縮的狀況，再加上因應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所進行的貨幣緊縮政策等，導致大陸在 1998 年左右出現了持續性通貨緊縮的現象。⁵

為解決目前階段的經濟問題，中共當局採取擴張財政支出的作法⁶，刺激總

¹ 吳玉山，「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社會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三期，2003 年 5、6 月，頁 23。

² 張弘遠，中國大陸經濟轉型中後發展地區政府角色與企業行為，**東亞季刊**，第三十一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九年，頁 54~59。

³ N. Lardy 著，隆國強等譯，**中國未完成的經濟改革**（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頁 2~8。

⁴ N. Lardy 著，隆國強等譯，**中國未完成的經濟改革**（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頁 9~10。相同的觀點可以參見道赤·童，「中國改革的三大戰役」，見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199~200。

⁵ 易綱、林明，「理解中國經濟增長」，**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第 2 期，頁 46。

⁶ 朱民、陳衛東，「反通貨緊縮：政策選擇和滯漲風險」，**世界經濟**，2001 年第 1 期，頁 3。

需求來持續經濟成長。⁷隨著成長動力由供給面擴張轉移到刺激總需求，過去藉由制度改革以提升要素、商品生產與交換效率的作法，已無法持續帶動中國經濟，因而中共當局現階段經濟工作的重點，在於；擴張家計單位的消費、增進政府支出，更重要的是促動廠商投資的增加，然而廠商投資往往需要根據其對市場反應的預期，若要廠商投資增加，那麼就必須要先出現對最終商品或中間財（intermediate goods）的市場需求。⁸

近年來大陸經濟正處於生產過剩所導致的通貨緊縮階段，市場消費者的所得雖然增加，但對於最終商品消費意願不高，根據研究，這主要是因為大陸消費者消費選擇能力的進步，或前期消費滿足之後的效果，進而導致品質較低或設計較差的產品出現無人問津的現象，胡鞍鋼便指出，從九〇年代初期，中國開始出現家用電器工業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九〇年代中期，又出現了從消費品工業到生產資料工業生產能力的全面過剩，根據大陸過去的國內貿易局對當時全中國 600 多種主要商品的市場供需進行分析，在 1998 年初調查時，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商品供過於求，1999 年初則發現約有三分之二的商品供過於求，其餘則是供需之間基本平衡，這也間接反應出中國大多數工業企業已經進入低利的時代。⁹

就商品消費理論而言，消費者在進行消費時，主要考慮的是：價格、功能與差異性，目前大陸廠商除了持續進行低價策略外，也針對產品功能與差異性等方面進行努力，而當務之急，是設法儘速引入或發展各種新型生產技術與產品，透過品質與效能的提升以便在市場競爭中站穩腳步。

雖然中國當局正試圖透過消費性貸款刺激對房地產、汽車等耐久財的需求，不過這些措施若要啟動企業投資意願，則似乎還需要一段時間，那麼當市場中不再是供給決定需求時，這種情況對大陸廠商而言無疑是一個十分嚴峻的挑戰。

那麼上述中國大陸內部生產型態與市場情勢的轉變，對於整體經濟成長形態帶來了什麼樣影響呢？回答這個問題遂成為本研究發想的起點。

參、經濟成長形態的轉換

目前，整個大陸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與經濟制度改革已經逐步到位，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面臨的經營環境正逐漸趨同¹⁰，產權差異與要素短缺對於產業發展與企業行為的約束效果也已明顯減弱¹¹，過去透過外部制度改革來提升廠商產能進而創造經濟成長的做法似乎出現效用遞減的情況。

⁷ 魏艾主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市場轉型**（台北：揚智文化，2003），頁 21~22。

⁸ 所謂的中間財的概念，是指廠商生產的財貨除了供家計部門的消費者使用外，還可以提供給其他廠商進行最終產品生產，前者便是我們所謂的最終財貨，而後者便是所謂的中間財。

⁹ 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16。

¹⁰ 韓朝華主筆，**戰略與制度：中國企業集團的成長分析**（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頁 9。

¹¹ 見孫早、魯政委，「從政府到企業：關於中國民營企業研究文獻的綜述」，**經濟研究**，2003 年第四期。

經濟改革之後，因為要素稟賦條件的緣故，大陸企業大多屬於外延式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廠商利潤與經濟成長主要來自於要素的貢獻¹²（主要來自於低廉的勞動與土地），就某種意義而言，此即為市場化制度變遷所帶來的效果，也是拉迪觀點的背景淵源。但是當市場競爭提高、市場需求不足、制度改革又無更進一步的利多時，習慣於過去「供給創造需求」的經營者，能否儘速調整生產模式或出現技術進步以取得比較利益，進而掌握持續發展的市場利基，這就成為中國下一個階段經濟成長的關鍵。

那麼中國經濟成長形態有沒有出現內生技術進步與引入內涵式生產的可能呢？大陸企業是否能夠發展出較符合其市場特性與稟賦優勢的生產模式？而研究者除了從要素貢獻來理解中國經濟成長的面向之外，是否存有其他促使經濟持續成長的可能原因？這些問題便成為本文關注的焦點，而為了回答上述問題，筆者嘗試由經濟成長的理論面向來展開討論。

第二節、經濟成長理論與中國經濟成長

壹、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階段

基本上，理解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意義之一，便是在於解答：何以其成效會遠較其他社會主義轉型國家為優，改革初期，大多數經濟學家並不看好中國雙軌制的改革，比較傾向支持蘇聯、東歐的改革模式¹³，然而中國經濟改革透過「邊學邊做」的效應，藉助選擇適合其國情的發展方式，修正過去的做法，在要素貢獻穩定與無明顯的技術進步之情況下，出現了顯著的經濟成長。¹⁴

按照整體改革進程的發展，錢穎一將中國經濟改革大致區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¹⁵

首先，第一個階段是在 1979~1993 年之間，此時中國的改革並沒有建構出一個統一的框架或是制度，而是以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在推進改革，這種改革方式對中國的經濟體制帶來了四個方面的改變：政府的地方性分權；非國有企業的市場進入和擴張；二元金融體制的運作；雙軌制的市場自由化。

錢穎一認為：1993 年以前中國的改革，大多是透過一些臨時性的制度創新而取得成效，對政府部門實行改革，同時並對其提供激勵，讓政府部門對於經濟成長而言不再是個負面因素，去國有制與準私有制的產權變革等作法使得經濟成長擁有了點火的機制，而金融體系穩定的運作使得政府可以藉由此一管道而獲得準財政收入，雙軌制的自由化則提供一個讓改革成本能夠最小化的機制。¹⁶

¹² 舒元、徐現祥，「中國經濟增長模型的設定：1952--1998」，*經濟研究*，2002 年第十一期，頁 9。

¹³ 林毅夫，「自生能力、經濟轉型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經濟研究*，2002 年第 12 期，頁 15。

¹⁴ 舒元、徐現祥，「中國經濟增長模型的設定：1952--1998」，*經濟研究*，2002 年第十一期，頁 9~11。

¹⁵ 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制度基礎」，見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170~190。

¹⁶ 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制度基礎」，見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其次，在 1994 年到 1998 年之間，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一個較為明確的發展階段，也就是以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畫經濟體制，在 1993 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中，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此後，中共當局開始不同於過去「摸著石頭過河」的做法，確定未來將以「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方式來進行改革。而在 1997 年九月的十五大中，更在所有制的問題上出現重大的改變，承認各種所有制形式應當共同發展，公有制應當具有多種實現形式，而私有制也取得了合法地位。

最後，在 1999 年 3 月，私有制形式和依法治國的原則被寫進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唯一一個在共產黨領導下將私有制與法制寫入憲法的國家，而在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大陸經濟體系在形式上已全面世界經濟體系接軌。¹⁷

綜觀中國整個改革，由原先放權讓利的作法開始，採取漸進、局部的改革方式，透過把餅作大的增量改革，迴避掉改革所可能面臨到的舊既得利益團體的反彈，而在持續推動的過程中，又進一步的建構起改革租金的分配機制與引入國際資本，使得改革得以擴大並繼續¹⁸，按照 Dewatripont and Roland 的模型觀點，連續性的局部改革將會出現一個悖論，就是改革固然會帶來好處使人願意持續改革，但也會形成既得利益團體使改革無法持續，但是何以中國的改革並沒有出現上述的悖論？錢穎一以為，主要的原因在於在第一個階段改革中所產生的利得，能夠獲得平均的分配，並沒有形成集中與巨大的利益集團，同時改革也持續擴大受益範圍，進而使得各個階層對於持續改革充滿期望¹⁹，而中國改革的內涵除了對內的制度改革與發展外，包括了對外開放，讓中國得以透過與全球經濟體系的聯繫，降低對於內部市場需求的壓力。而在吸引外部資源時，又引入了資本主義市場已經成熟的遊戲規則，進而使得其改革所導致的租金逐漸減少，市場運作的效率逐漸提高。

目前改革已由增量改革轉向為規範市場、政府管理與企業體制的方面，由於經濟持續成長使得市場交易中出現了大量的尋租行為，進而導致市場出現短暫失靈的現象，為此必須進行市場規範，而中共當局也自外國借鏡，正重建其總體經濟管理的體系，整個改革出現了持續市場化與重點突破的特徵，而隨著市場運作體系的日趨成熟，中國制度轉型將逐漸地由制度變遷進入制度均衡的新階段。

貳、中國經濟成長的階段與類型

2000)，頁 179~180。

¹⁷ 此一觀點為筆者之想法。

¹⁸ 按照 Dewatripont and Roland 的模型觀點，當一個大範圍的改革方案無法獲得多數支持時，採取連續性的局部改革或許是一個替代方案，換言之，也就是一個「分割-控制」的策略，而中國改革初期為了回答前述命題所採取的放權讓利改革、增量式改革或局部性改革，基本上都是一種「分割-控制」的型態，轉引自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制度基礎」，見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185。

¹⁹ 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制度基礎」，見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186。

根據大陸學者劉金全、王大勇等人的研究，改革後，大陸經濟成長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不同內涵的階段，分別是：1978年～1991年，1992年～1996年，1997年到現在，在這三個階段當中，主導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也各自有別，劉與王分別將其稱之為「供給因素驅動階段」、「供給和需求雙因素驅動階段」、「需求單因素驅動階段」²⁰，這三個經濟成長階段的特徵如下：²¹

一、1978～1991年，這個階段經濟成長的特徵是由投資擴張→供給擴張→消費擴張，GDP平均成長率為9.27%。其中總供給的有效擴張，以及所引發的進一步消費擴張，是此一階段經濟成長的主要關鍵；

二、在1992～1996年間，此一階段的特徵是由消費擴張→供給擴張→投資擴張→供給擴張，GDP平均成長率為12.08%。這個階段的經濟成長由於是消費擴張開始，引導經濟景氣的增溫，但由於後來政府擔心景氣過熱，進行政策干預以期能夠「軟著陸」，進而使得最後的供給擴張未能進一步的引發消費擴張，也為後來總需求不足的情況埋下了導火線；

三、1997年～至今，此一階段的特徵為投資擴張→供給擴張→消費擴張，此一GDP的平均成長率為7.84%。此一階段的問題在於其景氣循環進入了消費擴張之後，擴張程度未如預期，而在這個時間內又發生了「通貨緊縮」與總需求政策效力不足的現象，故而經濟成長速率降低。

參、中國經濟成長的詮釋途徑

簡述中國大陸經濟改革與經濟成長的過程後，那麼研究者又是如何去建構兩者間的因果關係呢？根據楊小凱的歸納，對於類似大陸這種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的研究，大致可以區分為二個譜系：²²

- 一、運用內生交易費用的經濟模型分析經濟轉型，如德瓦特里邦 (M. Dewatripot) 與羅蘭 (G. Roland)，麥克米蘭 (McMillan)、布蘭查德 (Blanchard) 等人的相關研究，主要的觀點為：過去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計畫特質導致了資源分配時產生過高的交易成本，造成經濟成長低落，轉型便是經濟體系如何降低內生交易費用的過程；
- 二、則是由轉軌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如拉迪 (N. Lardy)、諾思 (D. North)、溫格斯特 (Weingast)、錢穎一、薩克斯 (J. Sachs)、胡永泰 (Woo) 等人由制度、政策與歷史的分析概念著手，說明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過程。

大陸學者楊開忠等人藉由與楊小凱、錢穎一等人研究的對話後，另外補充了一個新的看法，認為主導大陸經濟轉型的因素應是：國家管制的解除。其等主張

²⁰ <http://202.130.245.40/chinese/zhuant/249869.htm>。

²¹ <http://202.130.245.40/chinese/zhuant/249869.htm>。

²² 楊小凱，「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收錄於楊小凱，**楊小凱經濟學文集**（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2001），頁102～106。

對於大陸經濟轉型的觀察，應自相關管制作為的取消，新型交易運作模式的出現等方面進行解釋。²³

無論是從何種面向切入轉型研究，都會不約而同的面臨一個問題：如何去評斷轉型成果的好壞？對此，往往須比對制度轉型前後經濟成長的情況，這使得「制度轉型」與「經濟成長」這兩個不同命題出現了相關性。

肆、中國經濟成長的解釋脈絡

在簡述中國經濟成長與制度轉型的相關研究後，明白經濟成長是如何被引入轉型研究的領域當中，那麼一般對於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解釋又有哪些脈絡呢？跟據劉霞輝的研究，對此可以簡單區分為三：²⁴

- 一、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切入，重視制度和政府行為變遷的分析；²⁵
- 二、運用現有經濟成長理論進行解釋，以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因素作為分析重點；²⁶
- 三、由外生變數切入，強調外資或貨幣政策對中國經濟成長的作用。²⁷

這三種解釋脈絡都曾出現許多不錯的研究成果，而台灣學界較為偏好由制度研究的角度去解釋中國經濟成長，筆者以為主要的原因在於：改革初期，大陸企業部門內部並沒有出現技術進步，學者在解讀時，自然會將制度變遷、交易成本等因素當作主要的解釋面向，並進而據此推論大陸整體經濟成長的原因與結果。由制度觀點來看，中國經改是一個制度逐漸合理化的過程，透過引入市場競爭因素與改變企業體制，要素配置、企業生產與商品交易的利得與效率獲得提升，進而使得大陸能夠發揮其比較利益，取得相關產業的生產優勢，進而帶動整體經濟的成長。

無論是市場機制對生產要素配置結構的改善，或是產權結構對於企業生產體制效率的提升，或是由商品市場由計畫分配轉換為市場競爭，或是外資企業技術與資金的引入等等，「制度研究」主要的焦點是放在制度變遷是否提高了商品生

²³ 楊開忠、陶然、劉明興，「解除管制、分權與中國經濟轉軌」，**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頁4~14。

²⁴ 劉霞輝，「論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經濟研究**，2003年第五期，頁41。

²⁵ 例如台灣學者吳玉山之研究大致上便屬於這第一類，吳教授觀察影響制度安排的策略操作，運用產權理論的觀點對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進行解釋，其指出：較佳的產權結構能夠激勵生產工具所有者對於生產與交易效率的追求，同時也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可使經濟成長速度增加；此外，較佳的產權結構也能夠給予企業更多的自主經營權，使其能夠較為靈活的反應市場的需求，進而活絡經濟，正因為大陸產權在改革中出現了較優的配置，因而使得中國大陸經濟能夠快速的成長。吳玉山，「探入中國大陸經改策略之研究：一個比較的途徑」，**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3期，民國92年5、6月，頁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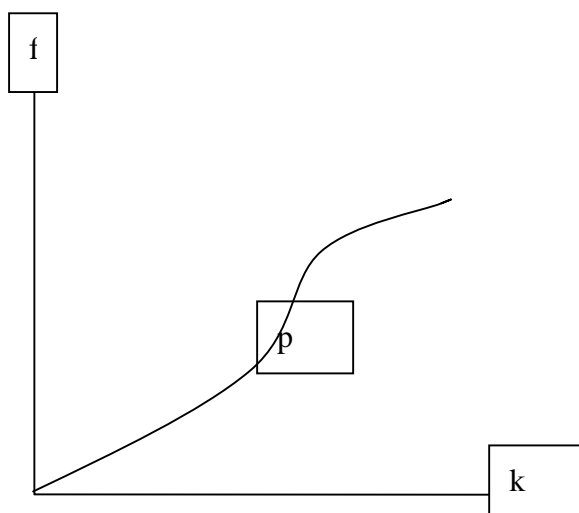
²⁶ 如魏后凱、王紹光與胡鞍鋼等人的研究便可以歸納為第二類，魏后凱、劉楷、周民良、楊大利、胡武賢等著，**中國地區發展—經濟增長、制度變遷與地區差異**（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王紹光、胡鞍鋼，**中國：不平衡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北京：中國計畫出版社，1999）。

²⁷ 如江小涓、程惠芳等人的研究則可以歸納為第三類。見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6期，頁6~7；程惠芳，「國際直接投資與開放型內生經濟增長」，**經濟研究**，2002年第10期，頁73~74。

產與要素分配的效率或利得。

上述解釋對於改革初期的經濟成長的確產生有效的解釋力，然而隨著市場化的發展、與全球經濟體系日益趨同、內生技術進步的出現、外資企業對於技術與產品的引入等等的情況逐漸出現，這類解釋的侷限逐漸出現，這使得學者開始去思考其他導致中國經濟成長的因素……。

一般而言，一個經濟體系的經濟成長應該是會有一時間限度而不會是永遠持續，而按照筆者設想，由經濟轉型所帶來的成長效果應該是條 S 型的軌跡（見圖一），在 p 點之前，制度轉型的成果將會提高平均產出，但隨著制度轉型進度過了 p 點之後，則人均產出便會出現邊際遞減的趨勢，何以如此？主要原因在於制度轉型初期，許多新創制度因較過去制度安排合理，因此提高了產出效率，但新的制度安排亦有其內生運作成本，因此當成本累積之後便影響此種制度對於產出的影響，進而導致產出出現了邊際遞減的情況，而其中 p 點代表的便是制度創新對於產出影響的最大值，若以此推論，經濟起飛前，制度扭曲情況較為嚴重的國家，那麼在制度安排合理化的過程中，其制度因素對於產出影響的時間也將會較長。



圖一 制度創新對產出之影響

f：平均產出 k：制度轉型程度

在過去的理解脈絡當中，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制度變遷或創新，由於其以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因此提高了商品交易與要素配置的效率，同時市場中的競爭，也為企業經營體質帶來影響，是故「制度改革→市場交易與企業經營等制度的優化→要素配置與使用效率提高→經濟成長」的邏輯關係便獲得了確立。

然而近年來大陸經濟成長的結構與型態出現了許多的變化，對此，大陸學者的歸納如下：²⁸

²⁸ 胡鞍鋼，「中國經濟發展前景」，見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 一、由總量擴張導向成長轉向結構調整導向成長；
- 二、從供給要素推動成長轉向需求要素拉動成長；
- 三、由工業主導帶動成長轉向工業和服務業共同帶動成長；
- 四、從投資主導刺激成長轉向投資和消費共同刺激成長。

從上述歸納當中，我們可以發現，經由過去制度變遷所創造出來，帶動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起飛模式」，隨著發展的脚步如今已有了不同的面貌，所強調的是：結構調整、要素需求、工業與服務業、投資與消費兼顧等等的方面，換句話說，過去中國大陸以供給面為主的制度創新或變遷，勢必面臨效用遞減的趨勢，簡言之，在解讀未來中國經濟成長的因素時，除了「制度轉型」之外，吾人也必須注意大陸經改當中的內生因素，因此若欲完整理解中國經濟成長，除了繼續觀察制度變遷的效應之外，研究者也必須回到經濟成長理論的範疇中進行對話。²⁹

第三節 經濟成長理論簡述與勞動分工模型的運用

壹、近代經濟成長理論發展

近代經濟成長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為了去理解經濟成長背後的原因與機制，在最初的研究中，將生產要素累積與配置當作經濟成長的主要前提（特別是資本要素的累積與分配），例如：早期，哈羅德與多馬模型的觀點。³⁰其後，梭羅(R. Solow)認為除了要素配置與累積的因素之外，還必須將技術進步的影響納入模型的分析當中。³¹

梭羅模型雖接受過去經濟成長模型的觀點（就是資本投入將會造成總產出增加），但梭羅假設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將會遞減，因此若想要尋求長期的經濟成長，單純依靠資本投注的方式將不可能達成目標，必須要配合上外生經濟成長因素—技術進步，才有可能導致一國經濟的長期成長。³²

頁 16。

²⁹ 基本上，筆者以為制度變遷所產生的經濟效益與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經濟效應是有所區隔，制度變遷是一個多因素作用的過程，影響也是多方面，但技術進步則是單指創新過程的結果，導致創新的原因有內、有外，因而大致可以區分為外生技術進步與內生技術進步。

³⁰ 如拉姆齊(F. Ramsey)從資本累積與經濟成長的觀念切入，點出了儲蓄與成長之間的關連性，其後，哈羅德(Harrod)與多馬(Domar)模型結合拉姆齊模型與凱因斯主義觀點，把就業、國民收入、投資與儲蓄之間的關連性相結合，認為儲蓄與投資間、投資與經濟成長之間存有相關性，所以若要促進一國經濟成長，則最基本的作法應該是要提高本國的儲蓄率。蔣自強、史晉川等著，**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二版），頁32~34。

³¹ 梭羅將技術進步視之為一個給定的「外生變數」，技術進步將能夠有效的節約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使用數量，而資本投入是導致技術進步的主要原因，按照梭羅的觀點，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在於技術進步與資本集中程度的提高，姚愉芳、賀菊煌等編著，**中國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型與應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24-28。

³² 新古典經濟成長模型的論述參見，陳明郎著，**經濟成長**（台北：華泰文化事業公司，1999），頁43-50；關於內生經濟成長與外生經濟成長理論之論述，請參見楊小凱，「重新思考貿易理論和經濟成長理論」，收錄於楊小凱，**楊小凱經濟學文集**（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2001），頁

梭羅的觀點吸引許多學者跟隨，形成了新古典經濟成長理論，其後，亞羅(K. Arrow)又進一步修正技術進步的內涵，將其由資本投入所引發的外生變數，轉變成可經由學習而導致的「內生變數」。³³

不過，由於無法有效解決如何對技術進步加以量化等重要的理論問題，使得經濟成長理論在七〇年代中期後逐漸失去光彩，一直要到八〇年代中期，經由羅默(P. Romer)對梭羅模型提出修正之後，才又將經濟成長理論帶回經濟學的主流領域。

羅默建立了以內生技術進步為主的經濟成長理論，強調：知識是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時生產投資的產物，是資本投資和資本深化的結果，新知識和技術進步是經濟系統的內生變數，而在內生技術進步的競爭均衡中，平均個人生產成長率與規模收益率將會隨著知識存量增加而遞增。³⁴

為了區別過去外生技術進步的成長理論，以羅默為首所建構的經濟成長理論也被稱之為「新」經濟成長理論，在這類模型當中，技術進步被看作是R&D之後的結果，而R&D的收益則是以事後特定利益的壟斷作為代價，而若欲追求長期經濟成長則依靠政府的行動，如：稅收、法治、基礎建設、產權保護或國際貿易、金融等方面的管理。³⁵

繼羅默之後，新經濟成長理論快速發展，目前各家觀點大致可以簡單區分為三個脈絡：³⁶

- 一、 知識累積模型：以羅默為代表，認為引發技術進步的主要原因來自於直接資本投資，所以在生產中累積的資本將可以代表當時的技術水準，直接將技術進步內生化；
- 二、 人力資本模型：主要以盧卡斯(Lucas)為代表，引入人力資本要素，認為技術進步取決於對非生產性研發單位的資本投入；
- 三、 分工演進模型：是以楊小凱與其他學者的勞動分工概念等理論作為核心基礎，認為專業化與勞動分工的演進將會引發經濟成長。

在其中，在詮釋大陸經濟成長的原因時，筆者以為楊小凱的分析架構具有相當的解釋效力，故本文嘗試以楊小凱的勞動分工觀點，對現階段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與產業發展提出分析。³⁷

291~293。

³³ 亞羅的學習效果模型的基本觀點為：學習將可以引發生產的技術進步，進而降低資本財生產時對勞動要素的需求，此外，學習所引發的技術進步將會導致外部效應，進而促使所有類似生產行為的效率提升，見姚愉芳、賀菊煌等編著，**中國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型與應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29~31。

³⁴ 見程惠芳，「國際直接投資與開放型內生經濟增長」，**經濟研究**，2002年第10期，頁73~74。

³⁵ 劉霞輝，「論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經濟研究**，2003年第五期，頁42。

³⁶ 姚愉芳、賀菊煌等編著，**中國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型與應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36~49。

³⁷ 楊小凱理論觀點參考自下列著作：楊小凱、張永生著，**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楊小凱、黃有光著，張玉綱譯，**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種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框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楊小凱，**勞動分工網絡的超邊際分析**（北

貳、勞動分工理論

近年來經濟學在各個發展中都有著許多新的突破，其中以舒茲 (T. Scultz)、貝克 (G. Becker)、楊小凱、黃有光、史鶴凌、伯藍 (J. Borland) 等學者由於將「勞動分工」與「市場競爭」兩個面向成功的加以聯繫，進而開創了新興古典經濟學學派 (new classical economics)，其中楊小凱的勞動分工理論更是整個學派的知識核心之一，楊的觀點不同於過去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成長理論，其從「楊格定理」中獲得啟發而發展出勞動分工理論。³⁸

楊小凱的觀點可以往上追溯到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勞動分工概念，簡言之，分工起因於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則受到交換能力高低大小的限制，也就是受到市場範疇的限制。其後，楊格 (A. Young) 進一步發揮此一觀點，其認為：勞動分工依賴於市場範疇，而市場不僅是由人口、區域等決定，更是以購買力決定，而購買力由生產力決定，生產力則是由分工決定。這個「勞動分工水準自我演化」的觀點，便是楊格定理。³⁹

楊小凱認為，假定交易效率是交易規模的增函數，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均衡分工水平便會上升，反而會擴大交易規模，因而提高交易效率，並刺激分工水平的再次提升。⁴⁰根據楊等人的觀點，由於存在著專業化利益，因此會使原本自己自足的經濟體系逐漸出現勞動分工的狀態，專業化所導致的分工雖然能降低生產成本，但卻會使產品交易成本跟著增加，在這兩項條件下，專業化將會存有一個最適解。在楊的模型中，專業化的決策將會決定當時勞動分工的水準，而勞動分工水準又會影響經濟成長，簡言之，勞動的分工將擴大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擴大又會反過來促進勞動分工的演進，不過，其同時也會提高交易成本，最後，當過去專業化利益的貼現值與交易成本提高所損失的經濟效用相等時，勞動分工水準和經濟成長率將會達到均衡。

在分工利得與市場交易成本相等時，此時將會出現一個動態的均衡，不過因為專業化生產中，人們會因為學習效果的出現而累積更多的生產經驗，進而提高了生產技術改進的可能，一旦這種可能出現，那麼將會導致生產能力增加而成本降低，專業化收益將會提高。

而當人們在專業化中得到的收益大於市場規模決定的交易成本時，就又会選擇更高的專業化水平，而分工便會邁向更高的水平，當勞動分工演進到一定水平並保有進一步分工的潛力時，則平均收入的成長率就會不斷提高，從而導致經濟有可能因為分工深化而持續成長。⁴¹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³⁸ Xiaokai Yang and Jeff Borland,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收錄於楊小凱著，*勞動分工網絡的超邊際分析*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417~436。

³⁹ 聶輝華，「新興古典分工理論與欠發達區域的分工抉擇」，*經濟科學*，2002 年第 3 期，頁 113。

⁴⁰ 聶輝華，「新興古典分工理論與欠發達區域的分工抉擇」，*經濟科學*，2002 年第 3 期，頁 113。

⁴¹ 姚愉芳、賀菊煌等編著，*中國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型與應用*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 36~49。

參、勞動分工與中國大陸經濟成長

中國經濟的成長，除了制度變遷與要素投入的貢獻之外，還有什麼因素也提供了直接的助益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可以由一篇大陸學者張永生的研究中得到些許的線索。

按照張永生的一項研究成果中似乎顯示出大陸未來產業部門成長的新趨勢，在其針對中國中小企業的一份研究報告中⁴²，其發現了幾個有趣的現象：⁴³

首先，中國企業的平均規模呈現出倒U的發展，也就是聘僱勞動數目是先增後減的趨勢，在1978年之前，中國工業企業平均雇傭人數的規模都是持續上升，⁴⁴而在1978年以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企業的平均規模卻逐步降低。⁴⁵

其次，張永生發現，國有企業再改革前規模持續擴大，而在改革後規模趨於穩定，而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則出現倒U型的變化趨勢，至於私營企業平均規模則在1989年後便開始下降。上述三種不同所有制的規模分別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但是研究顯示，若就企業營收效率進行排序，則結果卻剛好相反，小規模、高營收效率的企業逐漸成為中國經濟體系的主要部門。⁴⁶

張永生好奇的是，為什麼企業平均規模會縮小？為什麼在平均規模縮小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經濟卻會持續高速成長？而筆者好奇的是，為什麼在大型企業擁有較多經營彈性（如資金周轉、政府協助或行銷議價等能力）的中國大陸，中小企業的平均規模卻是縮小？更何況在經濟快速成長時，廠商大多應以規模經濟作為競爭策略，而大陸的中小企業規模縮小居然是種明顯的趨勢？

對此，張永生的回答是由寇斯（R. Coase）、張五常、楊小凱、黃有光等人的理論中產生，這派理論的主要觀點是認為：「分工與專業化是經濟成長和報酬遞增的主要原因，廠商規模同經濟成長並沒有內在因果關係，若分工在企業內部發生，那麼廠商的平均規模就會擴大，若分工在企業之間發生，則廠商平均規模就會縮小。決定廠商規模的主要因素是中間產品和勞動力相對交易效率的變化；決定經濟成長的是一般交易效率的高低。因此廠商規模的變化和經濟成長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現象，經濟成長可以在廠商平均規模擴大時發生，也可以在廠商平均規模縮小時發生。」⁴⁷

張永生認為楊小凱與黃有光的研究，可以合理的解釋為何大陸中小企業規模

⁴² 此處中小企業所指之規模為500人以下。

⁴³ 張永生，「中小企業發展的國際比較、理論解釋及中國問題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頁47~48。

⁴⁴ 如1957年的60.29人到1977年的128.67人，增加了1.14倍，其間最高的1973年則有144.63人。

⁴⁵ 1978年共企業平均規模為124.97人，1994年則為123.77人，人均GDP從1978年的823美元，到1994年已為1867美元，增加了1.27倍。

⁴⁶ 根據研究中小企業在大陸企業總數的98%以上，在工業總產值與銷售額的55%以上，見李驥、李麟，「中小企業生存與發展：競爭、治理機制與不完全競爭」，*改革*，2001年第五期，頁46。

⁴⁷ 張永生，「中小企業發展的國際比較、理論解釋及中國問題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頁49。

會越來越小的趨勢。在楊與黃的觀點中，當勞動的交易費用係數小於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係數時，分工便會導致企業出現，而假定企業制度存在，那麼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係數下降速度比勞動力交易費用係數下降速度快，那麼這種演進就會降低企業規模。⁴⁸

簡言之，張永生的觀點是，中國大陸最具活力的中小企業（也就是過去所指的鄉鎮企業或私營企業）其已經明顯的出現了分工優化的情況⁴⁹，而這種分工則是出現在企業與企業之間，因而導致其規模縮小，但獲利卻增加。

筆者以為這個「分工-優化」的解釋模型的提出，可以補充「制度-要素」解釋模型不足之處，也就是中小企業經由勞動分工帶來生產成本降低與加工層次提高，進而提升生產收益與產出效率，讓中國大陸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在現有的要素配置水準與技術水準下，卻仍然能夠維持一定成長的原因。筆者將嘗試在下文中以這個模型來對大陸兩個著名中小企業的發展模式進行驗證。

第四節、差序性市場化與產業關聯發展-以「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為例

根據楊小凱的看法，中國自從1956年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之後，其經濟體制便已經走上「去蘇聯化」的道路，而在1958年毛澤東開始推動行政分權，把開辦企業的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這個做法為中國的經濟體制帶來了新的面貌，也就是從過去的中央國有制轉變為分級國有制。⁵⁰

而在文革之後，由於中央計畫經濟體制的完全癱瘓，使得地方企業開始獲得發展的契機，而在七〇年代之後，毛澤東面對文革之後的中國，進一步的又推動行政分權的做法，要求各地政府、人民公社與生產大隊發展社隊企業，而這種立足於群眾路線的經濟發展策略，雖然不符合經濟規律，但是卻在無意間擴大了企業分級所有制的範圍，更重要的是這個發展強化了中國經濟中的分工趨勢，不過在當時沒有市場機制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分工層次雖然擴大，但是卻沒有市場機制進行要素、商品的分配與協調，因此各級地方企業只能透過其他管道（如行政體系、個人關係等）來進行「原始」的協調，這種交易模式限制了企業經營的效率。⁵¹

⁴⁸ 若分工是在企業之間發展，那麼每個企業就會越來越專業化，企業的平均活動範圍和規模就會越來越小，若分工和專業化是出現在企業內部，那麼企業中每個工人的專業化水平、企業的規模都將會提高。若中間產品的交易費用係數下降速度比勞動力的交易費用係數下降程度快，那麼在更專業化的企業之間的組織分工就會比在企業內部組織分工更有效率，因為前者多為中間財交易，而後者則為勞動力交易，如此一來企業平均規模就會下降。張永生，「中小企業發展的國際比較、理論解釋及中國問題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頁49~50。

⁴⁹ 關於企業規模的相關理論，參見Pak-Wat Liu and Xiaokai Yang, "The Theory of irrelevance of the size of the firm," 見楊小凱著，*勞動分工網絡的超邊際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275~295。

⁵⁰ 楊小凱，「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的經濟關係」，收錄於楊小凱，*楊小凱經濟學文集*（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2001），頁54。

⁵¹ 楊小凱，「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的經濟關係」，收錄於楊小凱，*楊小凱經濟學文集*（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2001），頁55。

換言之，中國大陸過去經濟最大的弊端，便是在計畫經濟體制中塑造了一個沒有市場協調的分工體制。一般而言，市場除了形成價格、供需交易、提供競爭的功能之外，還有一個協調的機能⁵²，所以中國經濟中的產業體系是有分工，但卻沒有一個有效率的協調機制，再加上這種強制性的分工方式，未能產生一個有機的分工網絡，進而導致分工並未出現專業化的利得，反而造成龐大的市場交易成本。

基本上改革開放中，相關的制度變遷主要是集中在消除龐大的市場交易成本，在市場化之外，私有化的發展則使得原先分工網絡中重現出有機部門-非國營企業，這些非國營企業（以下簡稱中小企業）大多是規模小、技術較低但彈性較大且預算限制較硬，這個領域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中最富生機的部門。

與此相對，為了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在大陸許多產業部門中，國有經濟部門高度壟斷的格局並沒有被完全打破，特別是銀行業、電信服務業、高等教育、醫療體系與傳播媒體等，這些產業大多是附加價值較高的部門，不少仍為國有經濟部門所控制。⁵³

根據張五常的看法，就中國大陸改革經驗顯示，在競爭激烈而壟斷難以為後的行業中，官方都樂於推舉自由市場及私產的保障。但凡是壟斷權可以維護的部分，官方政策則會傾向維持現況。⁵⁴

換言之，在這樣的情況下，整個中國大陸市場結構好像被分割成兩塊區域，一塊已國家的、代表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為主，另外一塊是高度競爭、各種企業體制並存的非國有經濟部分。前者市場化步伐因為受到政府政策保護而較慢，後者發展則較快，市場發展間的差序格局導致兩者間的市場結構也就有所不同，前者仍保有相當壟斷或獨佔的性質，而後者則趨近於自由市場。如此一來，前者市場中的協調能力仍有所限制，而後者中市場協調能力便逐漸的成熟與擴張，其結果便是前者往往仍停留在（或僅有部份改進）原先計畫體制下的分工型態，而後者則會出現了分工序列重整與優化的現象。

筆者的主要觀點是：倘若能夠在接受市場協調的情況下，迅速改變產業結構與生產型態，並進入新的分工網絡當中，那麼企業或產業的發展仍然能夠保有一定的成長空間，並誘發產業的關聯發展⁵⁵，倘若無法適應新的分工網絡，那麼將會導致原先所享有的優勢逐漸流失，進而在追求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必須另起爐灶。本文將透過對「溫州模式」、「蘇南模式」的討論來加以闡述上面的觀點。⁵⁶

⁵² Israel M. Kirzner, *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9~10.

⁵³ 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16。

⁵⁴ 張五常，「私產化與特權利益的衝突—中國體制改革的經驗」，收錄於張五常，**二十一世紀看中國的經濟革命**（香港：花千樹出版公司，2002），頁30。

⁵⁵ 一般來說，產業關聯主要有三種類型：一為向前關聯，也就是某一產業的發展誘導出新的產業崛起；二為向後關聯，也就是一個產業的發展對於那些投入該產業生產要素的部門影響；三為橫向關聯，也就是一個產業的發展對於其所在地區經濟結構和發展的影響。

⁵⁶ 楊小凱，「中國的經濟改革（1978~2002）」，見 http://www.jxj.com.cn/news_detail.asp?keyno=405。

壹、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的發展現況

溫州模式主要是民眾自辦企業，透過民生用品的生產與販賣，進而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⁵⁷，而蘇南模式則是由農民集體辦企業，透過與國營企業的關係來進行代工或中間財的生產，進而取得良好的發展成果⁵⁸，這兩個模式在八〇至九〇年代間成為中國大陸非國有經濟發展的主要典範。

長期以來對於蘇南模式（鄉鎮集體企業發展模式）與溫州模式（私營企業發展模式）孰優孰劣的爭議不斷，主要討論的焦點是放在究竟何種企業經營體制較能適應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的需要⁵⁹，然而隨著時間過去，蘇南模式已經是風華不再，但溫州模式卻仍是生機蓬勃，那麼導致這個情況背後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麼？

一、蘇南模式的轉換

按照洪銀興與陳寶敏的研究指出，隨著資源約束、需求約束與體制約束等環境的變化，傳統蘇南模式已經無法發揮帶動經濟成長的力量：首先，市場化的擴散效應使得鄉鎮企業體制的優勢逐漸降低，增加了企業環境的不確定性，而過去利用外延式發展模式的做法已經受到衝擊；其次，由於整體市場轉向為買方市場，改制後的國營企業與三資企業加入戰局，使得競爭壓力提高、競爭對手增加，市場銷售困難大增。⁶⁰

根據洪等的研究顯示（相關數字見表一），蘇南地區鄉鎮企業數量由1990年的9.5萬家，到1998年只剩下8.1萬家，但平均工業總產值卻從1990年的115.2億元，到1998年的916.6億元，若進一步計算，則在這近十年間，每家企業的產值由1990年的1千2百多萬元，到1998年的1億1千三百多萬元，顯見其鄉鎮企業數目雖然減少，但是其產值卻隨之上升，平均每家的產值增加了近10倍，不過有趣的現象則是，若看其平均固定資產淨值，在1990年為26.7億元，1998年則是189.3億元，若將平均固定資產淨值視為資本項目的投資，

⁵⁷ 關於溫州模式的發展過程請參見：Yia-Ling Liu,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1992, p.313~315。

⁵⁸ 關於蘇南模式發展內涵參見：吳大聲、居福田，「蘇南模式」，見周爾鑾、張雨林編，**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孫祖培，「國有、集體中小企業改革選擇與發展前景」，見胡春惠主編，**中國大陸國有中小企業改革選擇探析**（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9年）；劉雅靈，「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台灣社會學刊*，第二十六期，2001年12月；方孝謙，「統合化或私有化？鄉鎮企業產權改革的政經效果初探」，*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內部討論會論文*，民國八十九年；張弘遠，「產權改革與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不完全競爭—以蘇南地區產權改革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五卷第三期，民國九十一年5、6月；陳志柔，「中國大陸農村產權制度變遷的地方社會基礎：經濟社會學的思考」，**新世紀、新社會科技、勞動與福利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等單位主辦，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王信賢，「中國國企改革的組織焊接—吳江絲綢股份有限公司」籌組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三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

⁵⁹ 參見洪輝，「股份合作制與中國大陸鄉鎮集體企業—浙江與江蘇兩省發展現況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三十九卷第四期，民國八十五年五月。

⁶⁰ 洪銀興、陳寶敏，「蘇南模式的新發展—兼與溫州模式比較」，**改革**，2001年第四期，頁55。

那麼 1990 年的投資與產出的比值約為 4.3 倍，但 1998 年則為 4.9 倍，換言之，其資本產出並沒有大幅度的增加，而這似乎也反應出顯示其外延式生產的特色。

正因為成長速度減緩，因此使得自八〇年代末期以來，蘇南地區逐漸朝向外向型經濟、企業改制與城市化的方向發展，企圖利用對外經濟發展的政策，擴大本身製造業的代工能力，強化其中間財的供給能力，並組織大型企業集團來提高競爭條件，並全力發展城市工業，以期能振衰起弊。⁶¹

年份	1985	1990	1991	1992	1995	1997	1998
企業總數（萬）	7.8	9.5	8.9	9.2	8.3	8.2	8.1
平均工業總產值（億元）	45.4	115.2	147.0	300.3	625.4	795.8	916.9
平均固定資產淨值（億元）	10.2	26.7	34.1	42.1	137.8	169.1	189.3

資料來源：洪銀興、陳寶敏，「蘇南模式的新發展—兼與溫州模式比較」，改革，2001 年第四期，頁 56。

二、溫州模式的改變

基本上，溫州模式是一個由農民自發的個體私營經濟形態，主要由民生商品代工起步的發展模式，以家庭作為工廠，從民生用品開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中小企業生產民生用品（如鈕釦、皮鞋、服裝與打火機），其後逐漸佔領大陸同類型的商品市場⁶²，基本來看，溫州模式最大的特點在於其對商情的掌握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生產方式。

在溫州地區，由於當地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進而建立了市場資訊和技術取得的管道，同時也在民間中進行資本積累，進而有利於家庭企業的發展，然而，由於企業規模比較小且產品多為勞動密集型的小商品為主，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便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溫州模式的特點之一便是：注意對專業化市場的培育⁶³，以專業市場的建設來降低交易成本，進而大陸便有句話流傳：「哪里有溫州人，哪里就有市場。」⁶⁴

過去溫州地區的民營企業因為在資金、技術條件上的限制，故只能發展技術水準較低、規模較小的代工產業⁶⁵，而由溫州近年來企業組織演變來看，其企業產權關係已日益明晰（參見表二），而且在規模上都出現了明顯的擴張，進而顯

⁶¹ 此一結果與劉雅靈、張弘遠等人之研究觀察類似。

⁶² 郭志儀，「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模式比較」，見 <http://202.130.245.40/chinese/OP-c/257935.htm>。

⁶³ 「蘇南溫州模式的比較研究」，見 <http://www.rdf.org.tw/25/nal-1.htm>。

⁶⁴ <http://www.daokedao.com.cn/yanjiuwenzhoumoshi/xwzms.htm>。

⁶⁵ 「華鋒詮釋“新溫州模式”」，見 <http://www.cass.net.cn/webnew/file/200308258240.html>。

示出獲取規模經濟利益的強烈動機。⁶⁶

表二 溫州市工商企業、個體工商業登記情況：1998~99

類別 年份	國有 (家)	集體 (家)	聯營 (家)	股份 制 (家)	股份合作制 (家)	私營 (家)	外商投 資(家)	個體 (家)
1998	6110	18583	217	13697	28380	6590	915	203440
1999	5328	13390	185	14105	24990	8627	857	210444

資料來源：金祥榮、朱希偉，「溫州模式的變遷與創新-兼對若干轉型理論假說的檢驗」，見

<http://www.card.zju.edu.cn/data/%CE%C2%D6%DD%C4%A3%CA%BD.doc>。

隨著大陸市場化腳步加快，溫州模式也遇到了挑戰，一般而言，溫州模式的問題主要出在幾個方面：首先是產權的障礙，由於多為民營中小企業，因此難以透過聯合的方式迅速擴張；其次是家族企業因此企業管理制度尚未現代化，並限制企業規模的擴大；再者行銷方式的落後，過去主要是依靠「業務員」四處推銷，這種銷售方式需要有所改變；最後，企業缺乏核心競爭力，自主開發能力不夠。

⁶⁷

而根據洪銀興的研究，九〇年代開始，溫州模式已經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過去的家庭生產的家族企業模式已逐漸取消，如今則走向企業聯合、兼併、重組等集團化的方向發展，調整過去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經營模式，朝向資產經營、資本經營總和發展的道路，改變以小城鎮為依託的銷售方式，改採網絡經營的道路。⁶⁸

參、兩種模式改變的意含

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代表著是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兩種不同發展的模式，而兩者之間主要的差異是出現在企業體制與產品屬性上，蘇南多採集體制，透過與上海等地國營企業的聯繫，以生產初級加工的中間財為主，而溫州則多為私營企業（或紅帽子企業），主要是透過外出務工鄉親取得市場資訊，根據市場需要提供簡單製成的最終消費財。

兩者同為輕工業的發展型態，浙江正式發展鄉鎮工業的時間比江蘇晚起步，不過在 1996 年，浙江鄉鎮企業發展績效便已經趕上了江蘇，在 2000 年，浙江鄉鎮企業的營業收入超過江蘇約有 21.2%，兩者利稅總額的差距更大⁶⁹，一般以為導致蘇南模式落後的原因在於其企業體制中的產權問題，這使得蘇南企業體制的

⁶⁶ 金祥榮、朱希偉，「溫州模式的變遷與創新-兼對若干轉型理論假說的檢驗」，見 <http://www.card.zju.edu.cn/data/%CE%C2%D6%DD%C4%A3%CA%BD.doc>。

⁶⁷ 余映麗、李進杰等著，**模式中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頁 100。

⁶⁸ 洪銀興、陳寶敏，「蘇南模式的新發展—兼與溫州模式比較」，**改革**，2001 年第四期，頁 58。

⁶⁹ 余映麗、李進杰等著，**模式中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頁 185。

改革近年來逐漸朝向溫州模式接近⁷⁰，目前這兩地企業體制多已完成股份化的改造，那麼當兩者企業體制間差異趨同時，影響當地企業發展的便是市場結構，由於大陸目前普遍處於買方市場，進而導致市場競爭壓力變大，進而導致兩種模式都出現了新的變化。

若由這兩省的產業結構變化來看（參見表三），則我們可以看到，兩地間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發展都是在持續增加，也就是說，工業化與商業化這兩條路是帶動兩地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不過為什麼成效之間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年份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江蘇	浙江	江蘇	浙江	江蘇	浙江
1980		36.0		46.8		17.2
1990		25.1		45.4		29.5
1994	16.6	16.6	53.9	52.1	29.5	32.3
1996	16.1	14.7	51.2	53.1	32.7	32.2
1998	14.1	12.4	50.6	54.6	35.3	32.9
2000	12.0	11.0	51.7	52.7	36.3	36.6
2001	11.4	10.3	51.6	51.3	37.0	38.4
2002		8.8		51.2		40.0

資料來源：徐劍鋒，「產業同構：有多嚴重 滬蘇浙產業結構調查比較」，見 <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5/2105051.html>。

經過長期的發展，兩地同樣都居有良好的經濟基礎，相關的發展模式又都行之有年，但是何以會在九〇年代中期，逐漸出現不一樣的發展結果？倘若進一步去比較兩種模式最近變化的異同，我們可以發現兩者不約而同地採取企業集團化的發展方式，相異之處則在於蘇南強調外向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而溫州則試圖發展自主品牌與擴大行銷流通能力，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異？對此，筆者將進一步的加以探討。

肆、差序性市場化與產業關聯發展

一、蘇南模式的討論

蘇南地區市場化的過程由於受到集體產權條件的制約，因此市場成熟度較低，市場交易成本較高，在短缺經濟的市場情況下，蘇南模式的缺點並未顯現，更由於其鄉鎮工業發展較早，擁有先發優勢並得以搶佔市場先機，但隨著競爭日趨激烈，因而導致蘇南模式出現了問題。

⁷⁰ 參見劉雅靈，「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台灣社會學刊*，第二十六期，2001年12月。

蘇南模式之所以逐漸失去成長動力的主要原因，在於其分工體系在面對市場情勢改變之後，無法產生足夠的利得，何以如此？筆者以為原因在於其企業體制的限制，蘇南地區不是沒有分工情況的出現，蘇南模式最初便是一種城市與鄉村生產的分工，是一種國營與集體企業的分工，是一種加工型態的分工，這種分工模式早先的確產生了許多專業化的利得，但是由於受到企業產權不清的約束，在市場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當地的勞動分工卻無法進一步深化，使其迂迴生產鍊的長度受到限制⁷¹，也造成缺乏內生性的技術進步，當地廠商便停留在過去的產能與位階上，地方政府雖然嘗試以股份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但是卻未如預期，這便導致了蘇南模式的光環不再。

為何實行股份化後的蘇南模式，未能重振雄風？筆者以為這與其當地產業的生產分工有關，受到過去計畫經濟與改革初期所建立之分工制度的路徑依賴影響，蘇南地區鄉鎮企業多是為過去國營企業或大型私營企業進行初級加工財的生產，一來這種中間財的需求主要依賴最終產品生產的預期，過去經濟型態是以產帶銷，自然其能夠獲利，但當市場緊縮時，最終產品生產者自然會降低對中間財的需求量，再者，中間財的生產若是由各個鄉鎮企業來完成，那麼在缺乏良好市場交易分工的情況下，所衍生的交易成本也將降低其分工後的獲利。面對著上述情況下的蘇南模式，又加上缺乏競爭能力與技術進步，自然使得蘇南鄉鎮企業也就不會出現太好的表現。

為了再創蘇南經濟發展的動力，當地政府採取了一連串的措施，首先放棄其小企業發展型態，改以企業集團為主，並採多角化經營⁷²，這種發展趨勢基本上是反分工與反專業化，朝著擴大規模、自己自足的方向前進，若由楊小凱的分工理論角度來看，企業規模擴大的原因是在於企業內部出現分工，而企業內部之所以出現分工則是因為中間財自行生產的交易成本遠較在市場中進行交易來的低，換言之，專業化生產的利得小於分工的成本，因此企業便向自己自足的方向發展，進而出現了集團化的趨勢⁷³，而這個趨勢也就說明了原先以鄉鎮企業發展為核心的蘇南模式進入了歷史。

此外，集團化的發展趨勢注定了其必須走向規模經濟的道路，換言之，也就是設法降低生產成本並提高產品附加價值，進而當地企業便開始重新尋求生產方

⁷¹ 迂迴生產指的是，在進行某一商品（A）的生產過程中，若能夠使用多種生產工具，那麼為了取得這些工具則又會引發更進一步的生產行為，進而在生產 A 的過程，出現了更多的經濟效益，而這些互有關係的投入、生產過程就如同一個個鏈，關於迂迴生產鍊的概念請參見：楊小凱、張永生著，**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頁 142~144。

⁷² 見王信賢，「中國國企改革的組織焊接 - 「吳江絲綢股份有限公司」籌組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12 期，2000 年。

⁷³ 在王信賢與張弘遠的研究中，地方企業集團化的主要原因在於試圖取得較多的資金挹注，不過若將資金視為生產要素，那麼換言之，以鄉鎮企業或個別國營企業的型態較不容易在市場取得生產要素，換言之，市場交易成本對其而言較高，但是若集團化之後，則交易成本便隨之降低，故市場外部環境也是導致其採取自給自足的集團化模式，參見張弘遠，「產權改革與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不完全競爭 - 以蘇南地區產權改革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五卷第三期，民國九十一年 5、6 月；王信賢，「中國國企改革的組織焊接 - 「吳江絲綢股份有限公司」籌組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12 期，2000 年。

面的利基，由於此地企業原先多為初級加工者，因此持續投入加工領域的作法轉型代價較低，故導致了目前蘇南地區廠商多積極地進行加工層次的升級，試圖進入高級加工財的領域或由原先的ODM轉型為OEM的型態，產業出現了向前關連的發展趨勢。

一方面為了讓本地企業能夠藉助外力盡快出現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另外一方面也為了讓企業能夠修身養息，將發展地方經濟的重擔卸下交由他人背負⁷⁴，因此蘇南地區開始採取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透過使用「準經濟特區」的作法，將外資引入其內進行生產，由於多數外資是進行加工生產，這種情況等於是在江蘇內部建立一個與全球經濟生產分工的網絡體系，只不過這種分工網絡內，本土企業數目較少⁷⁵，進而未能出現帶動地方企業技術進步與擴大分工網絡的預期結果，反而發展到最後，由於外資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既快且高，導致當地政府改以吸引外資企業作為發展經濟的主要手段，原先蘇南模式反而被置於一旁。

二、溫州模式的討論

溫州模式在面對市場競爭與外界對其產品品質批評的壓下，必須要設法增加其產業競爭能力與產品品質，增加產業競爭能力的作法是提高產能與降低成本，為此溫州開始進行進行更進一步的分工，透過專業化的方式來進行生產，原先溫州的四大支柱產業出現分工深化的趨勢，各種服裝、皮鞋等商品的零部件生產紛紛進行了分工的專業化生產，而由於此地市場化的程度高，中間財的交易成本較低，進而導致迂迴生產鍊增加，並引發中間財種類分化的情況，進而形成一種面密的分工生產網絡，而隨著分工生產層次的演進，進而也帶動了交易分工的演進⁷⁶，因為分工層次也會引發市場規模的擴大，進而會導致交易趨向專業化的方向，而溫州市場交易運作的本來發展就較為成熟，而交易專業化的趨勢使其更能夠去推動行銷流通網絡的發展，使得溫州人的行銷能力更為提升。

生產分工導致專業化利得上升，交易分工使得市場交易成本降低，這讓溫州模式的成長潛力更為提升，當地要素報酬比率也隨著上升，這使企業獲利情況較佳，同時也取得擴大規模的機會，進而讓溫州企業出現了逐漸成長可能。

溫州模式的問題出在其廠商規模太小，雖然創利能力強但在要素使用上無法出現規模經濟，這使得近年來溫州也在推動企業集團化的發展，同時也試圖在市場銷售與產品生產上取得平衡，期望透過產銷共進的方式帶動地方經濟的成長，因此其一方面向上開拓中間財的生產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持續提高其市場銷售的效率，進而導致其產業出現了向前與向後的關聯發展。

⁷⁴ 劉雅靈，「吳江經濟轉型的外在動力：從本土進口替代到外資進口替代」，**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會論文**，2002年5月，頁4。

⁷⁵ 相關論證參見：劉雅靈，「吳江經濟轉型的外在動力：從本土進口替代到外資進口替代」，**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會論文**，2002年5月。

⁷⁶ 楊小凱、張永生著，**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頁153~155。

第五節、結論

本文主要試圖去說明：對於中國大陸「目前」的經濟成長，除了透過生產要素配置效率來解釋之外，還需要由勞動分工與分工層級的角度切入探討。主要觀點在於：在大陸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支持其快速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除了資源配置因市場機制出現而獲得較為合理的運用之外，市場協調機制的建構過程中對於勞動分工的提高與分工體系的發展，也是逐漸成為大陸經濟成長的原因之一。

大陸經濟改革所採取的漸進式市場化的做法，造成市場成熟化的腳步不同，導致了不同地區市場中協調產業分工能力的差異，對此，筆者以為這正是「差序性市場化」所帶來的影響。

本文透過與經濟成長理論的對話，反省目前對中國經濟成長解釋的圖像，並運用勞動分工的模型，說明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如何因為不同的市場成熟度導致兩個知名成長模式在產業發展趨勢上的差異，期望能夠透過此一研究成果，為解讀中國經濟成長的工作提供參考。